

· 青 · 年 · 学 · 者 · 文 · 库 ·

付明端 著

从伤痛到弥合——

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065

11

I712.065

42

阅 览

20/3/11

本书获浙江理工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金(2012年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经费和浙江省重点英语专业建设项目资助

从伤痛到弥合——当代 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 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

FROM PAIN TO HEALING

—EVOLUTION OF WOMEN CULTUR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WOMEN WRITINGS

付明端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借助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以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文化身份取向的变化过程为研究主线,揭示几代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演变,并对此变化的策略及内在原因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

本书适合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英美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和相关领域的教师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伤痛到弥合: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
嬗变/付明端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6
(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118-08884-7

I. ①从... II. ①付... III. ①华人文学—妇女文
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595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4 $\frac{3}{4}$ 字数 156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 (010)88540777

发行邮购: (010)88540776

发行传真: (010)88540755

发行业务: (010)88540717

序

“文化身份”的丢失与建构是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付明端的专著着力从少数族裔的弱势群体——华裔女性的特殊批评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美籍华裔的社会心理变迁，打破西方主流文化所刻画的传统华人女性模式，丰富与拓展了文化身份理论研究。

19 世纪初，中国妇女以家眷、雇工、应招新娘等不同身份，陆续抵达美国。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妇女不断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与压抑。长期盛行的美国种族歧视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制思想使流散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产生了沉重的历史失落感。丢失自我的感觉是痛苦的。于是，她们拿起原本属于男人的笔，通过书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积极探讨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女性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如何维系与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伍慧明及伍邝琴是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她们的女性书写揭示了华裔妇女在美国霸权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所面对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她们的作品浸润着盛行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印记，竭力再现被长期遗忘的华裔移民历史，探讨华裔女性政治、文化和性别身份的多重性，对华裔女性文化身份构建做出重要贡献。作为移民女儿的华裔女作家，她们深入研究华裔移民母亲和她们渐渐西化的女儿在多元文化相互冲撞过程中遭遇的诸多纠葛和矛盾，揭示华裔女性在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遭到的源自主流社会的压迫以及她们通过奋争重塑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

汤亭亭等人的作品以及由此催生的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

随着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对华裔文学的专门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华裔文学研究不仅包含文学领域的基本命题(如爱情、婚姻、男女平等),还涉及种族、政治研究、文化身份研究、美国亚裔文学、妇女文学、有色女性主义作家等方面,这使华裔文学在人文学科的前沿研究中体现出特殊价值。在中国大陆,有关美国文学的研究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但是,华裔女性文学研究是最近十几年才刚刚兴起的一个新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也有相当数量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专题讨论华裔女性文学的贡献和社会意义。

付明端的专著在总结与吸纳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有其新意。作者借力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提出华裔文化认同呈现混杂状态。华裔文化在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建立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屈从于主流文化。为了生存和进入宿主国的文化主流,华裔不得不接受另一民族的文化价值,但是,隐藏在他们的意识或者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时时刻刻与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不同的文化特质相互交汇、碰撞,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不断流散的状态导致文化构成要素的不断变化,因此,文化身份研究是动态的,它永无完结、始终处于过程之中。后殖民理论强调身份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完全由血统来决定的,它是社会和文化持续作用的结果。作为主体的人必须不断地自我定义,寻找自身在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中的身份形成与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族裔散居者的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一直持续的复杂过程,移民文化在有选择地适应宿主国文化的过程中,与之融合,逐渐演变成一种全新的文化——一个既同故土文化和宿主国文化相连而又与两者完全不一样的第三种文化。

IV

霍米·巴巴将这种混杂性视做“文化翻译”的结果,在这种“文化翻译”中,因为相互之间存在不同,移居他乡流散者的文化身份不断被改变和更换。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早已难以找到一个单一的、完全本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多元民族和全球性的移民高潮使得各国文化的多极因素日益浓厚。文化的“全球化”是否会出现是一个有待历史证实的问题,但是,即便将来文化“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它也应该是不同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全球化”,而绝不是一些人想象和鼓噪的那种基本消除文化差异的全球文化“一体化”。真正的文化多元性必须坚决打破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只有超越对立,弱势文化才能在强势文化中保持自身的特质优势,成为多元文化中的新生力量,进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融合。

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是一个不断建构、永不停止的连续进程。随着中西文化之间日益的了解和融合,她们的身份将被一直更新,一直转换。汤亭亭等五位作家的作品展现了不同时期华裔女性对“地球人”、“女性谱系”、“典型美国人”和“中西译者”文化身份的选择,反映了华裔女性在寻求自我、发现自我、确认自我过程中的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在上述文化身份中,新一代华裔女作家所宣扬的“中西译者”身份超越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模式,是两者相互融合、共存、共生和互补的“第三条道路”,在强调文化多元并存的当今社会有巨大影响力。

《从伤痛到弥合——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对五位重要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整体归纳和梳理,通过系列研究,付明端对美国华裔女性形象背后所隐藏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心态,以及中美文化冲突下的华裔女性整体的身份建构与文化选择提出独到的见解,在同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此来对照现实,也必定会加深我们对自己民族和社会的理解、省察与认识。

美国华裔文学是付明端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这部专著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延伸撰写完成的。她曾充分利用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的机会,查阅阅读了大量中英文资料,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在校内外导师和专家的帮助与悉心指导下,付明端认真修改,不断完善,历时两年,写成较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其中的艰辛或许只有有过相同经历的人士才能够深切体会。博士毕业后,付明端继续深化该主题研究,力求从文化的角度,探寻华裔女性形象在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发展、嬗变及其文化寓意,努力开拓华裔文学批评新领域,已有一些文章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我相信她会继续坚持她所喜爱的研究方向,并希望她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张定铨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年2月1日

目 录

绪论	1
一、华裔女性主义中母女关系的再现	1
二、当代华裔女作家对殖民内置的反抗策略	6
三、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批评:历史与现状	11
第一章 “文化边界的闯入者”	
——历史与文本再现的美国华裔女性	18
一、美国华裔女性的历史	18
二、文本再现的美国华裔女性	25
(一) 华裔女性的规约性描述	25
(二) 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29
第二章 文化边缘地带的母亲	39
一、被遗落的留守母亲	39
(一) 遗落中的迷失	39
(二) 生命的挽歌	44
(三) 走向自醒	46
二、流散美国的母亲	49
(一) 破灭的美国梦	49
(二) 沉默的“他者”	55
(三) 声音的盛宴	60
(四) 姐妹情谊	65

第三章 文化夹缝中的女儿	69
一、迷失自我的边缘人	69
(一) 世界之间	70
(二) 致命的拥抱	73
二、母女冲突	78
(一) 文化价值冲突	79
(二) 难以跨越的语言障碍	84
三、寻找母亲的花园	87
(一) 女性主义理论观照下的母女关系	87
(二) 文化的返乡	91
(三) 回忆赋予力量	96
第四章 文化融合中的女性理想	101
一、流动中的融合	101
(一) 现代母亲向典型“美国佬”的转变	103
(二) 文化杂交中女儿的成长	107
(三) 饮食文化中的“新新人类”	111
二、成长路上的引领者	117
三、中西文化的成功“译者”	121
结论	126
参考书目	130
后记	141

绪 论

在美国华裔作家的舞台上,女作家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生力军,她们的作品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读者与批评界及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华裔女作家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她们的文学创作跨越了文化之间、语言之间以及代沟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她们用文本叙事来抵制主流文化对华裔女性形象的歪曲定义,多方面地反映了华裔女性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

一、华裔女性主义中母女关系的再现

20 世纪 60 年代,从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到反越战争,众多社会和反主流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人们开始质疑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传统文化理念,发出了反主流文化的呐喊。随着社会及政治地位的提高,少数族裔的族裔意识逐步增强。与此同时,如火如荼的各种运动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对性别、政治、阶级和种族的理解。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①则更加强了女性在家庭、职业、社会福利和反家庭暴力等领域的意识,使女性主体、身份以及自我政治化,她们开始拒绝内部/外部、主体/客体、个人/集体、男人/女人等二元思考模式。女性主义者还强调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她们尤其强调男女在历史、法律、健康、教育、职业、体育、政治等领域的差别。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华裔女性和主流文化白人妇女共同深受多种运动思潮的影响,但是有色人种妇女一直和白人妇女存在疏离感,华裔女性对主流

^①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的 60—70 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始于 19 世纪,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主要焦点问题是女性选举权、受教育权利及女性就业。

女性主义者建立在所谓情感基础上的“姐妹情谊”感到不舒服,同时她们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建立的性别联合也不感兴趣。华裔女性更关注政治意义上的姐妹情谊,认为这样才能明确异同,从根本上批判美国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的压迫、剥削和权利关系。因此,和其他有色族裔妇女一样,华裔妇女没有选择站在同种族男性的对立面,而是在她们处于附属地位的社区继续她们的传统和对话。^①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在谈到有色人种女性话语和权利的被殖民化处境时认为,这不仅是西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霸权的结果,同样是因为具有支配性的白人女性运动造成的。按照莫汉蒂的说法,这种殖民化隐含着对异质主体的控制和剥削,她批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把有色人种女性当做是“与她们有共同的兴趣和渴望,是可以紧密联系的团体,从而把阶级、道德、种族矛盾放置一边。二元结构赋予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以特权,把她们的声音和经验作为女性标准,认为她们是文明、理性、坚强、道德的代表,而亚裔女性依然是无知、没有教养、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受害者形象。”(Mohanty 1991, 51)许多华裔女活动家在目睹了华裔妇女及华裔男性包括她们父亲、丈夫、儿子、兄弟、爱人和朋友所承受的压迫后,更能理解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由于众多华裔女性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历史、语言及反抗策略被消隐或无声化,妇女解放运动反对男性的宗旨没有得到华裔女性的积极响应。

由于身处复杂的政治和文化从属地位,华裔女性不能像白人妇女一样,简单地把自己的理论实践理解为反抗性别歧视及家庭平等方面。^② 在《给母亲的信》中,亚裔女权主义者吴淑英(Merle Woo)谈到她对“黄色女权主义”的定义:“黄色女权主义者意味着她既是社区活动家也是人文主义者,她既不等于与非亚裔人群和亚裔男性的分离,也不

① 同样,其他少数族裔妇女努力和同族裔男性保持对话,有关论述可参考 Cade (1970), Combahee River (1981), Davis (1983), Fregoso and Chabram (1990), Bell Hooks (1990, 1992), Pesquera and Segura (1993), Powell (1983), Quintana (1990), Wallace (1990), 及 Wei (1993) 的著作。

② 具体可参考 Allen (1986), Anzaldúa (1987), *Asian Women United of California* (1989), Cade (1970), Moraga and Anzaldúa (1981), 及 Smith (1983) 的作品。

意味着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力结构和控制地位。但黄色女权主义者代表着反抗欺辱、约束亚裔,使亚裔种族失语的白人和男性,代表着改变伤害亚裔的所有经济、阶级制度和心理力量(其中包括男性至上主义和种族歧视)。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她代表一个社区。”(Woo 2003, 124) 华裔女性同样关注她们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而这些关注点是主流女性主义话语和实践所遗忘的。“更确切地说,致力于性别与种族斗争的亚裔妇女感觉白人妇女没有意识到她们所关注的重点,对此也没有表示同情。尽管亚裔女性和白人妇女有很多共同关注点,但亚裔妇女更多强调取消种族压迫而不首先是性别歧视。她们愿意团结在集体中,要求改善她们种族有待提高的生活状况,而不仅仅强调妇女自身的问题。”(Chow 1989, 362)

与白人女性不同,中国妇女及华裔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文化及政治关系中保留了自己的权利,在中国社会、民族和革命长期运动中,中国女性为争取女性平等谱写了灿烂的历史篇章。从孙中山反对满清政府的早期革命,到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当代各种运动思潮,中国女性一直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各种不平等现象。历史学家发现,早期具有女性意识的中国妇女们,无论来自农村或城市,她们都敢于打破沉默,积极言说自己的贫穷、饥饿以及生理和心理上遭受的屈辱和恐惧。同时,进步的中国女性与男人一起反抗女人束脚、纳妾制、封建婚姻以及女性在教育上的不平等待遇,她们参与各种社会和公众活动,宣扬女性在教育、婚姻、职业、财产权利及话语权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些斗争活动作为民族遗产,对美国华裔女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有很大影响。致力于美国华裔妇女研究的杨月芳教授(Judy Yung)在分析一份中国在美国的最早报纸之一——《中西日报》(*Chung Sai Yat Po*)时,特别关注到中国女性的解放,她认为在美国,通过对20世纪国内女性解放的宣扬,从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华裔女性受到很大影响,她们开始用“新女性”重新定义自我,“她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充分利用美国的资源,努力为自己和她们的女儿们寻找教育机会。”(Yung 1986, 205)

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推进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著作《生为女人》(*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1976)开启了对母性以及母女关系的研究,从此叙述母女关系的文学创作成为女性研究的主要主题之一。里奇强调研究被忽视的母女关系的重要性,她说:“母亲失去女儿,女儿失去母亲都是重要的女性悲剧。我们把李尔王(父女分裂)、哈姆雷特(母子分裂)和俄狄浦斯(母子分裂)都当做是人类悲剧的再现,但是目前没有对母女情感的认可”。(Rich 1976, 237)马瑞安·赫斯切(Marianne Hirsch)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在专制文化中没有对女性的系统理论研究,没有女性受压迫的理论,更不会考虑到女人作为母亲和女儿的身份,不会研究女性与前辈或后代的关系,不会在更宽的领域内如情感、政治、经济和社会家庭结构探讨女性之间的关系。”(Hirsch 1981, 202)由于女性对子女的关照和教育,在社会和历史层面自然把女性放置在家庭的位置,在具体、可渗透的社会空间,众多女性定位并建构自我,她们同时建立与家庭、社区甚至其他更多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家庭并不是女性唯一表现自我的场所,而且,家庭也不是与种族、社会或政治隔离的私人孤立空间。美国长期禁止华裔入籍的历史使华裔家庭成为广大华裔生活中更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揭示了处于附属地位少数族裔痛苦和复杂的生活。

非裔美国女作家格洛萝丽亚·吉斯(Gloria Wade Gayles)对里奇的《生为女人》中有关母女关系评价道:“母亲和女儿在女性行为和自我身份方面由于家长制观念而彼此疏远,在家长制社会中,母亲要教育女儿遵守女性传统美德,如被动、高尚及理性等”。(Gayles 1984, 8)女性,无论她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在母性方面拥有相同的思想,女儿要走向独立的重要任务是疏离曾经依恋的母亲,而摆脱母亲的管束好像成了女儿成熟的特征之一。从这个方面理解,“女儿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拒绝母亲,或者把自我定位在有限空间的家庭主妇角色,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多年令人厌倦而无成就感地抚养孩子,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服务任务,这样就意味着是要失去自我价值,处于被压迫的地位。”(Gayles 1984, 8)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伍慧明及伍邝琴作为当代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不约而同地把母女关系定位在家庭,并通过种族、性别、社会经济问题把家庭问题复杂化。她们的创作提供了华裔母亲和女儿在宿主国与故国之间建构并重构自我的机会,她们的女性书写揭

示了华裔母女在美国霸权社会、历史和政治现实中所面对的矛盾和困惑。

处于附属地位的少数族裔妇女在白人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作为被剥削的劳动力,她们经常像商品一样被交换和剥削,被奴隶化和契约化。她们的家庭和社区极少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无法在白人主流社会中进入重要的政治和权力领域。处于历史的不公和被压迫状态,有色人种女性强调家庭和社区的意义,而这些事情在主流女性主义或女性意识中被完全忽视了。早期的母女关系主要反映白人为中心的妇女运动思想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或移民群体的文化背景。因此,华裔女性的多彩故事一直没有成为母女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很少学者从心理分析或文学角度分析亚裔或华裔母女之间的冲突。^①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少数族裔女性作为一个巨大的女性群体,当家庭观念、社会结构以及身份建构与白人女性有所不同时,继续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理解有色人种母女关系是不合适的。这促使许多有色人种女性作家不再依赖主流女性主义话语模式和叙事,她们开始寻找适合于她们种族母女关系的表现方式。这些作家在作品中一方面深刻揭示母女之间的巨大冲突,同时强调母亲创造出的强大社会和情感力量使华裔家庭成为政治避难、种族反抗的场所。

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在谈到贫穷的亚裔和其他有色人种劳动阶层母亲时,认为她们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是少数族裔女性不断努力与不平的现实斗争,努力通过自己独有的艺术方式,利用语言,有时甚至超越语言把少数族裔母亲们的期待、奋斗精神、文化及历史展现给她们的女儿们,而此种传统的继承被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伍惠明、伍邝琴等当代华裔女作家深刻地反映在她们的文本中。她们的作品依据

①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关注母女关系,但是,对于华裔女作家笔下的母女关系研究依然没有完整系统的研究。关于谭恩美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国外可参考 Heung (1993), Ho (1996), Ling (1990), Lowe (1991), Schueller (1998), S. Wong (1995), Lim (1990), Cheung (1993), T. Yamamoto (1998) 的文章。国内程爱民和陈爱敏近几年在核心期刊也发表了相似主题的学术论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色人种女权主义思想,竭力再现被长期遗忘的华裔移民历史,探讨华裔女性政治、文化和性别身份的多重性,因而对有色人种妇女文化身份构建做出重要贡献。作为移民女儿的华裔女作家,她们深入研究华裔移民母亲和她们西方化的女儿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出现的各种纠葛和矛盾,她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打破沉默,揭示自己母亲和男人共同承担贫苦家庭责任的现实,揭示女性在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遭到的来自主流社会压迫以及她们身处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困惑与不安。作为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女性书写,华裔女作家关注第三世界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女性,她们的作品及其研究对女性主义理论有着积极的丰富和完善作用。

在反映华裔母亲和女儿们自身以及母女之间的生活状态时,当代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以华裔女性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为主要关注点,强调她们文化身份由冲突到融合的变化。当代女作家作品中的华裔女性在历经文化、社会和历史方面的矛盾和困惑后,开始寻求交流和沟通,在经历冲突和磨难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母亲和女儿在西方社会生存的精神力量,同时,中西文化和母女关系走向彼此理解和认可。华裔女作家们提倡的更灵活的文化交融方法促使华裔女性深刻地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母女关系从伤痛到弥合的故事对当前疏离或破坏妇女的思想、话语和机构具有一定的挑战意义。

二、当代华裔女作家对殖民内置的反抗策略

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后殖民式新殖民的国家”。(廖炳惠 1994,13)美国后殖民主义的目的不是争取民族权利(sovcreignty),而是获取平等的公民权利。这说明了美国的后殖民主义社会特有的本质,也表达了后殖民主义与少数族裔之间必然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也沿袭了众多欧洲殖民国家的殖民传统,尤其是种族划分的思想,将种族差异融入了自己本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内部,并使其构成了自身民族建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种继承直到现在仍旧以不同的隐性方式出现。

在后殖民统治的美国社会,由于少数族裔的出现超出了他们固有

的认知范畴,面对他们自己完全陌生的人和物,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将其陌生化、神秘化、他者化、妖魔化。在美国,无论亚裔曾在美国生活工作多久,对美国社会做出多大贡献,白人总是把亚裔永远界定在美国人的范围之外,刻板化为永久的“他者”。在最早美国主流文化中,被歪曲描述的华人形象一直是邪恶、不可理解、无法同化的外国人和异教徒。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开丑化族裔形象虽然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但对华裔的刻板化描述还是以隐性方式持续。对于美国华裔人而言,“模范少数族裔”是1965年以后对华裔刻板化的典型例子。当华人勤俭节约、遵纪守法等优秀民族传统被视为美德时,华裔新的刻板化形象大量出现在主流媒体及文学创作中,这其实和原来固定在美国华裔人身上“黄祸”的称号一样,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霸权专制思想。因为已经被赋予了如此的荣誉和称号,美国华裔人就不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放弃对白人文化构成威胁的自身族裔传统文化,停止继续要求理所应当属于自己的权益,主动完善言行举止,自觉成为对主流社会有益的少数族裔。著名华裔作家赵健秀在《啊呀!!! 亚裔美国作家选集》(Al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1974)中概括了美国华裔人的殖民内置思想:“整整七代人在法律的种族主义和被委婉地称为‘种族主义的爱’的压迫之下形成了亚裔美国人的自我轻视、自我排斥和自我瓦解。被排斥在美国人范围之外的亚裔已经将这种排斥内在化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Frank Chin 1974, 10)这种不自觉形成的殖民内置化最早主要出现在美国华裔文学的早期文学创作中。对于在美国出生,又接受西方教育的第二代美国华裔作家而言,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和接受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从小目睹祖辈们被美国主流社会放逐在边缘地位,这些作家迫不及待地展现自己的可同化性。许多华人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小说是刘裔昌(Pardee Lowe)的《虎父虎子》(Father and the Glorious Son, 1943)和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和白人读者一道赞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明显表露出华裔殖民心态和自我东方化思想,反映了种族主义留在少数族裔内心深处无法愈合的创伤和挥之不去的“种族悲哀”。(Anlin Cheng 2001, 21) 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

义运动相继蓬勃发展起来,这是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坚持单一文化和倡导多元文化矛盾的结果,也是唤醒族裔及其族群文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机,对促进当代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关系学、文学和文化研究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众多少数族裔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西方传统的文学实践,向传统文化思想发出质疑和挑战。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当异质文化发生接触和冲突时,一种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作为霸权文化将自己凌驾于另一种相对弱势文化之上的普遍现象,同时也分析弱势文化为保护自身避免文化殖民而采用的相应方法与策略。此处提到的弱势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少数族裔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后殖民文学作品也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它们一方面揭示被殖民者的内心体验,同时也强调在获得自身的主体建构、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方面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意义。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含混、杂糅、间阔、第三空间”的新思想,认为当代文化的确立不再出自传统固定的中心,而是在不同文化接触的边缘处和交界处有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居间”的(in-between)、杂糅的身份正处于不断完成的状态;所有流散的族裔(包括处于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只能处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融合中构建自己新的身份认同。彷徨于故国与宿主国、故国文化与宿主国文化中间,而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此种“居间”的优势,脱离故国身份或宿主国身份的困惑,综合运用以上两种文化话语,与它们各自保持对话式的联系;在多种文化共存的状态中探求文化差异,重新审视个人认同、社群归属和国家建构的传统观念,建构出一种跨越种族之争、具有和平精神的全球身份。(Bhabha 1994, 445)毋庸置疑,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和杂糅理论给陷入身份建构困境的少数族裔作家们带来了启发。“对主流文化统治的内置并不意味着(被殖民者)对其彻底的妥协、彻底的承认失败,相反,它意味着(被殖民者)重新思考人被剥夺的能动性的意义”。(Anlin Cheng 2001, 21)后殖民作家近年来不约而同地开始从被殖民者的角度看待东西关系,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建立自己的主体文化。当然,正如霍米·巴巴认为的那样,后殖民作家的抵